

## 民族认同是如何形成的——简评《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散布与传播》一书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是一位享誉全球的政治学家，他著作等身，最为人称道的一本书是：《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散布与传播》，这部著作被称为解释上述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理论典范。在本书中，安德森试图从民族情感与历史文化根源出发探讨不同地域范围、不同种族属性的、散布于全球各地的“想像的共同体”。

在本书中，作者对民族作了如下定义：“它是一种想像的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像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是享有主权的共同体”。享有主权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就是这块土地上的事只能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做决定。那“有限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通过概念之间的比较来达到一个更清晰的理解。它是有限的，这是她和宗教与国际组织的最大差别，民族成员数量和分布范围是可以确定的，譬如我们中国人都会说自己有 13 亿同胞，散布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们不会把日本人或者美国人囊括进来，也不会对中国以外的其他部分产生神圣领土的归属感，而宗教和国际组织总是希望把自己的成员和影响范围尽可能扩展，直至覆盖全世界、全人类。

同时必须注意到的一点是，这个有限是一种宏观的有限，奠基于无限的想像链条构筑的论证循环之中。最为有限的团体莫过于家庭，我们遗传着相似的外表和性格，讲着相同的语言，但是民族成员之间的认同并不需要彼此之间的血缘和文化关联，也不需要彼此认识。譬如汉族和藏族同胞之间关于“中华民族”的共同认知就是由唐朝时期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和亲、清朝历代皇帝对于达赖喇嘛和班禅转世程序的直接控制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援藏干部的崇高事迹等一系列历史叙述构筑起来的。

今天人们对这个领土范围和人口归属清晰界定的民族国家——世界体系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它诞生至今却只有短短三百年的历史，北美最早、欧洲其次，广大的亚非拉殖民地和后发达国家的民族认同的形成甚至不足百年。譬如道光年间，林则徐在广东主政，他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海防形势，开始广泛收集关于洋人的资料，整理成《夷情备采》一书。其中译有在华洋人出版的《澳门月报》道光十九年（1839）及二十年（1840）的记载：“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仍不知西洋。”也就是说，大多数中国官员只知道天下，不知道国家。他们既无法理解大清是一个国家，也无法理解大清之外还有英吉利、法兰西等其他国家。

那么，这种想像的、有限的、拥有主权的共同体是如何在短短两三百年间散布到全球各地的呢？安德森充分运用了人类学、比较史学、历史社会学等理论工具展开了丰富而精彩的论证。他把民族主义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我把他们概括为四个波段：第一波是新大陆的镜像民族主义；第二波是欧洲的方言民族主义；第三波是意识形态化的民族主义；最后是殖民地的民族主义。

安德森认为，美洲新大陆是现代民族和民族主义最早形成的地方。从十五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以来，来自欧洲各地的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美洲，在北美，来自联合王国的最多，因此形成了英国在新大陆的十三个殖民地，即后来的美国建国十三州；而在中南美洲则主要是西班牙人的领地。这些殖民地和母国同文同种，也建立了相似的社会政治制度，却在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先后独立建国。安德森认为，这是“精英阶层‘朝圣之旅’的受挫以及印刷术的普及所致”。美洲殖民地的拓荒者一般都是母国的中下阶层，即便在当地担任行政工作的官员也

比国内官员地位更低，他们只能回母国述职和传达新的旨意，想要回母国担任高阶官员或被上流社会认可几无可能。作为美利坚建国三杰之一的富兰克林就有着长时间在英国寻求公职却不可得的沮丧经历。在印刷术日益普及的当时，这种殖民地精英和母国精英之间的区隔不断发酵，而新大陆孤悬海外的独特地理位置又更容易产生自我认同，他们开始将对母国的依恋转为新国家的想象，这种想象在报纸、文学、戏剧以及知识分子社群的不断交流而得到确认，一种母国的“镜像”慢慢成为了新国家的形象。

第二波的民族主义是方言民族主义，这一波民族主义恰巧处于欧洲中世纪结束，绝对主义国家形成时期。在中世纪，罗马教皇有着绝对的权威，在欧洲各个帝国以拉丁文书写的圣经和用拉丁文传播教义的高级僧侣构成了一个覆盖整个西欧的神权政治体系，形成了一种以共享文化和信仰的认同。而到了绝对主义国家时期，随着印刷术的普及，不同方言体系的人们可以获取廉价的方言读物，以拉丁文书写的教义和书籍不再垄断文化传播，方言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不同文明的发现，而天文学和物理学的进步则撼动了神学的至高无上地位，欧洲人开始审视基督教文明的偶然性。特别的，一种新的时间观念的确立尤为重要，即从本雅明所说的“弥赛亚时间”到一种“空洞、均质”的时间观的改变。这是最让人费解的一个观点。所谓“弥赛亚”，即犹太教中的世界末日，犹太教与基督教共享《圣经》的一部分即《旧约》，其中有关于世界末日的记载。在中世纪基督教信徒的时间观中，时间是无限循环，所有现世的人都是有意义的，他们的生命目的是在末日得到救赎，其意义是确定的，不依赖历史书写而存在；而在新的“空洞、均质”的时间中，则是线性的、连续的，所有生命独自存在、必将消亡，历史必将进步，正如人们必将死去，而死去正是进步之必要前提。正是这种时间观把时间从纵向拉到横向，人们才开始意识和关切周遭的一切的有限和无限，相同与差异，这是民族认同形成的必要条件。

第三波民族主义我称之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此处的意识形态，我取马克思之经典定义，即由社会现实和社会存在决定的，服务于统治阶级的一种虚假意识。这一波民族主义和前面两波最大的区别是权力在其形成过程中的广泛介入。在18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欧洲统治者还在用王室联姻和封建领主作为自己的统治纽带和后盾，随着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掀起的民族主义滔天巨浪，它们顿时陷入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境地。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境内存在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英格兰四个不同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内的日耳曼人、奥地利人、波兰人都有着不同的语言和历史；俄罗斯帝国更是囊括了20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100多个不同的民族。它们在同一国家生存与其说是自愿形成的共同体，不如说是历史残留的现状。因此欧洲王室急需将民族主义这匹“烈马”驯化、“收编”，既消除来自它的威胁，又巩固自己的统治。欧洲王室正是逐渐通过推广通用语言、灌输国家意识以及把自身与民族象征勾连起来来确立统治合法性的，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沙皇俄国推行的俄国化政策。

第四波民族主义是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的建构性最为明显。我们打开非洲地图，看到的非洲国家行政区划犹如尺量笔划一般，这是当时的殖民者瓜分非洲土地时人为确立的边界。这种非自然边界自然不能保证域内族群的历史文化的一致性，其建构过程很大程度依赖于知识分子的想象。想象的一个重要资源就是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参照。萨义德在他的《东方主义》中认为，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一个自我文明的证成的资源就是对非西方文明的批判，通过对非西方国家的野蛮、落后、非理性的描述来为自己的殖民扩张提供理论依据，这种批判与其说是恰如其分，不如说是一种隐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安德森在这里反过来看，认为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正是通过对帝国主义的邪恶、强暴、贪婪的描述来为本民族善良、勤劳、勇敢等优秀品质张目，他们在殖民地统一的教育和文化体系内发挥了这个功

能，这些观念的积淀为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最后，我要说明的一点是，在国内，这本书的标题“想象的共同体”总是给人以解构民族主义之想象，为人误解。安德森认为民族的形成并不仅仅是权力的作用，如同上面分析的那样，权力作用下的民族主义不能代表民族主义的全部，它是在历史经纬和文化记忆的基础上编织建构的，而非凭空捏造的，这是它“有限性”的来源，也是它合法性的来源。与其说民族是被故意安排的，不如说是命中注定的。民族主义兴起以来，国内外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实现民族之自由独立、繁荣兴盛而慷慨赴死，难道我们可以用一句“他们都是被愚弄了”而一笔带过吗？不，不能。当我们享受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与荣耀、和平与幸福的时候，须知这如同空气一般透明但却如大地一般坚实的身份，凝结着先辈的血泪。

严禁复制